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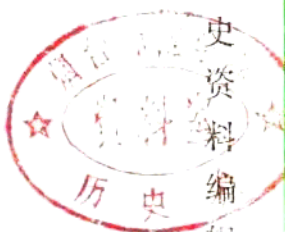
1914

第 **3** 期

1984.10



阳江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阳江文史资料



目 录

阳江县地理概述(三).....罗鸿文(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阳江革命运动

.....县党史办公室(6)

阳江豆豉.....冯一森(11)

阳江设关史略.....谭启浩(15)

南鹏矿山沿革.....(18)

南鹏岛的今昔.....鲁 曾(19)

日寇铁蹄下的南鹏岛(转载).....龚日泉(21)

六·六事变.....钱 仁(27)

阳江冯盎墓与张世杰墓.....曾传荣(39)

[阳江历代建置]

三个守御千户所和北津城.....高阳云(29)

岗背塔—古代的航标.....叶柏来(33)

阳江儿歌.....梁英邦(37)

我县文物信息两则.....林尚知·莫志强(45)

阳江方言(一).....许培栋·叶柏来(46)

花木·鸟兽·虫鱼之名.....奇 松(55)

消 息.....(60)

作者·读者·编者.....(61)

封面设计·题字·篆刻.....潘 铎

阳江县地理概述(三)

罗鸿文

五、自然资源和生产品概况

(三) 森林、草场资源和林、牧业生产概况

1、森林资源和造林绿化

森林是自然界的重要资源之一。它不仅可为人们在食、住、行、用等方面提供大量物质,而且在改造自然,抗御自然灾害,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保障农业高产稳产,保护环境等方面,都起着巨大作用。

本县地处南亚热带的最南缘,山地、丘陵多(占全县总面积近七成),宜林面积广(占全县总面积57%),水热作用活跃,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迅速,树木成林成材快,对发展林业生产,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

历史上,本县多为热带常绿季雨林所覆盖。从四十年代残存的林相或从有关资料看,从解放后本县南部沿海所种椰树、县内各地所种的胡椒、橡胶及其他热带作物的正常生长情况看,都可说明本县过去森林植被的概况。但由于本县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过历代的毁林破坏,所保存下来的森林面积不多,至解放前的1949年,全县仅剩下自然林18万亩左右。加上一些零星的“风水林”,小果林、“五边”树等等,也仅有20万多亩。森林复盖率不过4%,而且分布极不平均,主要集中在新圩、塘口、大八和合山等区。其中合山地区,在五十年代“以粮唯一”的思想指导下,自然林已多遭破坏,剩下来的,仅新圩、塘口接壤的望夫(东水)山和大八的珠环山和暗哨,因交通不便,开发困难而保存较多。这一带的森林,绝对数量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现存的可说是本县的“绿色宝库”。如新圩的东水乡及其周围绵延十多里,漫山遍野均为森林所覆盖(一般在山的下部为竹林、中部以上为树林)。这里树种繁多,生长茂密,且多为高大的乔木,面积达6万多亩,常绿、阔叶、混交、多层等林相比较明显。林中有不少为本县粮食植物、本县油料植物、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有的树种经济价值颇高。在这些丰富的植物资源中,还蕴藏着各种野生动物资源,如野猪、箭猪、果狸、黄猿等兽类以及穿山甲、金钱龟、蟒等爬行动物。鸟类也尚有多种。但由于长期

的肆意捕杀，不加保护，特别是毁林开荒，环境恶化，致使鸟兽逃散，至今剩下来的，已为数不多了。然而这些保留下来的植、动物资源，却为我们研究本县生态系统、恢复植被和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很好的科学依据。因此，对现有的动植物资源，应严加保护，以保持生态平衡。

解放后，本县造林绿化取得了很大成绩，至1980年止，全县累计造林面积达400万亩（其中飞播占55%）。但由于乱砍滥伐，重种轻管，成活率不高，保存下来的仅有43万多亩，加上原有自然林，国有林（国营农林场所属）等，全县有林面积为70多万亩，占林业用地的22.7%，森林覆盖率为13%强（略高于12.7%的全国平均数）木材蓄积量110万立方米（国营林场占31万立方米）。为了加速林业的发展，国家投放了大量资金，采用机械造林，在合山建立了简易机场，实行飞播与人造相结合，以加快林业发展的进程。同时建立了省属国营林场一个（下设五个分场），以生产热带、亚热带作物为主的农、茶场五个，拥有林地100万亩。本县也先后创办了北山林场、暗礁林场，建立了林科所和苗圃场，培养了一大批以区乡为主的林业技术骨干，加强科学研究，应用和推广林业新技术，积极引种外来优良树种并获得成功。这对推动和加速本县林业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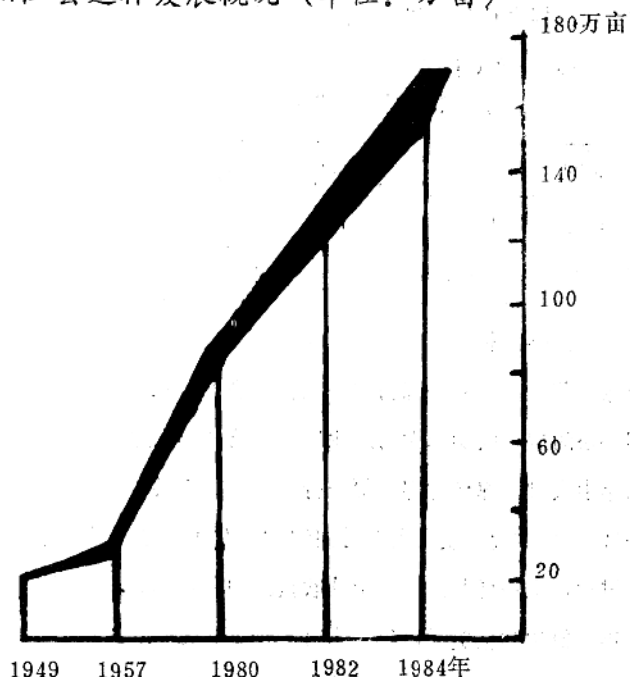
然而在1979年以前的30年中，由于山林权不稳，政策多变，森林破坏严重，保存量不多，一些无林少林地区的自然生态失调。有林地的林分结构也不够合理，林种树种单纯，如县属有林面积中，用材林占86.2%，光是针叶林就占了66.8%。国营林场有林面积17万多亩，却全部为用材林，其中光是马尾松一种，即近10万亩，占总面积的56.7%（见表四）。由于

表四 阳江林场树种构成表

树 种	数量(亩)	占全林%	备 注
桉	39,587	23.15	
杉	8,881	5.2	
国外松	20,677	12.1	包湿地松、加勒比松
马尾松	96,950	56.7	
木麻黄	3,888	2.27	
樟	20	0.01	
竹	961	0.56	
合 计	170,964	100	

结构不合理，未能很好地发挥森林的多种效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县委的高度重视，加强了对林业工作的领导，落实了山林权和各项林业政策，摸清情况，作出规划，大搞飞播和工程造林，并发动群众，大搞开发性承包，使本县造林绿化工作有了新的飞跃。

解放后阳江县造林发展概况（单位：万亩）



从1981年起至1984年中的三年多时间，全县人工造林达40万多亩，飞播造林49.1万多亩，发动群众在“四旁”植树650多万株。由于主管部门采取一系列科学造林和管理措施，扭转了过去只种不管或造管脱节的状态。这些新造林成活率都在90%以上，保存率也达到80%左右，使造林一片，成活一片。不但成活率和保存率高，而且速生快长，成林快。如上洋区濠湖乡伍锡均联合体承包的约4千亩表土冲刷严重、岩石裸露的荒坡地，在1984年4月下旬种下的隆缘桉（本县俗称细叶桉），至同年10月上旬，不到半年时间，已从10多公分长到普遍两米多高，最高的达到4米。现全县森林覆盖率已从1980年的13%提高到现在的19.8%；蓄积量也从1980年的110万立方米增加到149万多立方米（阳江林场占46万立方米）。三十五年来本县共生产木材78万多立方米（其中国营阳江林场向国家提供5.4万立方米），竹子140多万担，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生产的需要。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本县从美洲引进一批速生、高产、多脂的树种——湿地松、加勒比

松和火炬松，通过林业战线的科技人员培育试种成功，现全县已发展到30万亩（主要为湿地松，其中国营阳江林场占2万亩）。这些树种，对土地环境的适应性甚强，不论平原、山地、陡坡低丘、土壤肥瘦以致沙化严重甚至岩石裸露的地方，只要按照本县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均能正常生长，据本县林业部门的测试，湿地松的蓄积生长量比本地马尾松高2倍，产脂量比本地马尾松高1.5倍（见表五）。

表五 湿地松与马尾松生长量与产脂量比较表

树 种	造林时间	调查时间	平均胸径 (CM)	平均树高 (M)	亩株数	亩蓄积 (M ³)	单株产脂 市斤/天
湿地松	64年5月	82年5月	21.5	15.4	60	19.5	0.7
马尾松	64年5月	82年5月	17.6	11.3	60	6.4	0.29

（根据县林科所测试结果）

因此，它已成为绿化荒山秃岭的先锋树种，在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大有发展前途。

本县引种国外松的试种成功和它的速生快长以及几年来造林绿化的成就，获得国内外的的一致好评。1982年中央林业部杨钟部长等一行，亲自到本县检查林业生产情况，对本县造林绿化给予高度评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林业专家也先后到本县考察研究，对本县绿化、特别是引进树种，生势喜人，表示十分欣赏。1984年10间，美国惠好林业公司（美国最大的林业公司，年产值达50亿美元，年产木材3千万立方米）以副总裁约翰·麦可曼为首的五人考察团到达我国，并专程来到本县。他们考察了那龙、北惯（东莺）以及林科所等处大面积的湿地松等树种，频频竖起大拇指说：“Very good！”（很好！）表示称赞。近几年来，四川、湖南等省以及本省很多市、县的专家、林业工作者以及两户一体的代表也纷纷前来本县参观考察、交流经验，对本县造林绿化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由于成绩显著，先后得到中央、省、市林业部门的多次表扬，成为本省造林绿化的先进县之一。

造林绿化已初步改变了森林分布不均的状况，同时对改造环境、以林护农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过去本县森林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少数边远山区，现在从山区到沿海以及中部平原地区，均有成片森林分布。东部的东平、新洲一带的飞播林，到处生机勃勃，一派翠绿，林叶茂密，荫蔽度大，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变了当地的自然貌，儒洞、溪头等沿海沙荒地区，由于人工林和防护林的迅速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沙对农田的侵袭为害，调节了大气的温度湿度，以林促农起到一定作用。

本县海岸线长，受台风和风沙的危害严重。内陆尚未绿化的荒山、荒丘及沿海沙荒仍达

100多万亩。本县北部和西部山区又是暴雨中心，土壤冲刷强烈，水土流失严重。因此，有计划地、尽快地把本县荒山、荒丘绿化起来，特别是沿海防风固沙林、漠阳江等河沿岸（尤其是上、中游）和水库周围以及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水源林和水土保持林，更为重要。现本县已作出初步规划，争取在近期内把森林复盖率从现在的20%左右提高到30%，到本世纪末提高到53%，即把全县所有荒山、荒滩、荒丘都基本绿化起来。但在造林绿化的过程中，必须改变过去用材林多，经济林少；针叶林多，阔叶林少；纯林多，混交林少的状况，使森林的多种效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同时还要注意林地养分的不断输入，保证土壤肥力的不断增加。本县人工林地枯枝落叶长期来得不到保存，经常被捡拾净尽。这样不但使林地得不到应有的养分输入，致使土壤肥力降低，地力衰竭，不利于林木的生长，而且也起不到森林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作用。因此，对一些情况严重的地区，有必要进行封山育林。在封山期间，严禁入林区拾柴火和猎兽打鸟，使植被和地力尽快地恢复起来。

2、草场资源和畜牧业生产

本县山地丘陵多，水面广，地形复杂多样，对发展畜牧业也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

据调查，全县尚有千亩连片宜牧草场（草山、草坡）达25万多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4.4%），其中万亩以上的6块，五千亩以上的18块，这些都是本县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宝贵资源。加上本县水热条件好，草场再生能力强，对发展草食大牲畜较之其他地方更为有利。如以十亩左右可养大牲畜（牛、羊等）一头计算，总载畜量可达二万多头。

在历史上本县畜牧业，靠天然草场养殖的，所占比重很低，主要的还是家畜家禽。本县家畜家禽的饲养，历史上一贯发达，解放后，饲养量更是大幅度增长。如养猪业从五十年代起，即以“猪多、肥多、粮多”互相促进，全省闻名。

本县又是全省一个著名的“三鸟之乡”，发展速度也很快。从五十年代初的40多万头，发展到1966年达140多万头（均是存栏量），“十年动乱”时，因“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曾一度下降。直至1979年才恢复到原来水平。只就蛋品一项来说，1980年全县蛋品收购量达431万多斤，占当时全湛江地区（11县2市）总收购量的58%，居全省各县之冠。1982年全县三鸟存栏量达163万多头。（据阳江县统计局1983年统计资料）

本县出产的“黄鬃鹅”，以其肉嫩味美，一向饮誉省港澳，与清远的“乌鬃鹅”同为本省的优良品种。

除鹅、鸭、鸡等三鸟之外，近年本县对养鸽、养鹌鹑、养蜂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阳江革命运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春)

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突然袭击，进行大屠杀，大逮捕，大肆摧残革命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阳江的革命同志也是这样。阳江反动派在“四·一五”“清党”，经过大屠杀，大逮捕，大肆摧残工会、农会、农军后，工农会虽然被瓦解了，在县内的革命力量被严重摧残了，但在广州等地的共产党员，不怕牺牲，迅速回到阳江，重燃革命烈火，高举革命火炬，在破垒中重整旗鼓，开展战斗了！

一、阳江重建党组织，展开战斗

(一)重建阳江党组织

1、在广州、上海的共产党员回阳江密谋重建党组织。

许高爵同志在上海参加中国共共党，“四·一二”后，转回阳江，在县中教书。冯宝铭（现名冯君悦）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在中山大学参加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广州国民党叛变后，他曾返阳江与许高爵密谈。当时敖昌骅等同志已被解往广州，阳江已无党组织活动。七月，冯宝铭被中山大学宣布开除学籍。他转到香港，与省委取得联系，决定派他回阳江组织农民武装。冯秘密回到阳江城，寄居于东砵村亲戚家，密与许高爵、廖绍琰（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参加共青团，次年春转为共产党员）共商恢复党组织。廖、冯还到织篲找农运党员郑就兴，又和郑到桐油了解原农会负责人；后冯又陪同香港派来阳江秘密视察的工友××（广州人，忘其名）到漠头村了解情况。十一月，冯到香港汇报，省委派李元、黄超及招待所负责人谭夏声（现名谭天度，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与冯宝铭接头，冯受命返阳江工作。

2、中共阳江县委成立

许高爵、冯宝铭等分头活动重建阳江党的组织，在县城的区业勋等工人同志也联系上了。冯宝铭去香港后不久，许高爵等按照省委指示原则，阳江成立了第一个县委组织，许高爵为县委书记。党员仅有十多人。

（二）阳江的政治经济情况

阳江自“清党”后，政治势力掌握在豪绅地主手上。县长陈章袞倚仗地方势力，以暴政残民。（能够指挥大部份豪绅）。驻防军不多（警备队一十三师三十九团二营一连，共三百余人），而欺凌老百姓的事则常见。当时九区为匪帮钟均记盘踞，并发展到三区，匪患日炽。（驻防军屡剿无效）。农会早已解散，人民失去自卫的武装力量，而所谓防匪的民团成为地主豪绅的工具，勒收公路费，追征田粮（已征至民国十九年）。奸商勾结豪绅运谷出口，米价飞贵。自工会解散后，工潮仍有发生。木箱壳行老减板薪，工人反对，进行罢工，县长受贿，拘捕工人积极分子，老板开除工人。工人多失业，工农生活极端困苦。

（三）在工农中重新组织斗争

冯宝铭从香港到广州，准备回阳江，适广州起义，冯宝铭、廖绍琰一同参加了。冯参加赤卫队，廖参加政工队。十二日晚，冯宝铭带武装包围中山大学宿舍搜捕反动派，当时被捕捉的其中有阳江籍学生叛徒许学彬，叛徒已逃跑。广州起义失败后，冯、廖便分头撤到香港，转返阳江。后闻中大校长戴季陶请准当局对冯宝铭通缉，冯遂改名陈光，从香港转到那洛村陈昆才家。

广州起义失败后，阳江反动势力更嚣张，白色恐怖更严重，开展党的工作更加困难。一九二八年二月，理发工人郑锦源（阳江人），由香港党组织派回阳江搞工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他一边理发，一边深入理发工人中串联发动，先后发展了冯国怡等三个理发工人入党。

丹载乡民团团长许名德（又是校董）是陈昆才中学时的同学，陈昆才到丹载小学教书，冯宝铭利用这个关系也跟着到丹载去，在丹载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丹载村在大革命时期刚组织起农会，在成立时遭遇“清党”而瓦解了。此后，他们为了互助互救，曾自发组织“公益会”，可是历时不久，随即涣散了。冯宝铭到后，积极扶助他们，恢复了“公益会”，借以接近和启发教育团结群众。几个月间吸收了陈昆才、谭履谦（现名谭原、也是丹载教师）、许名飞、许名骐、许基旭（团丁）等参加共产党。许基旭协助冯宝铭到北惯串联农民，秘密联系，相约掌握枪枝。丹载“公益会”发展了二、三十人，准备以民团为骨干，情况许可

时就搞武装斗争。合山为土匪控制，驻军借剿匪扰民，民不聊生。贫苦农民自助会，会员约三十人。开始时不少地痞参加，半是农民，组织不完善，派同育工作。在阳江城东门外化民医院（教会办的）发展陈宝才为党员，以化民医院省委迁往香港）与阳江党的秘密通讯站。冯宝铭从香港回来时，曾带有泥印机一部（用特制墨水写在有光纸上，复置在泥板面上，墨迹在泥板，可印数十份），在丹载小学印制传单，对敌斗争。当时，县城理发工人已成立工人自救会，开始作经济斗争。所有这些工农组织与斗争，都是在恶劣环境中用群众经济互助的形式，去开展活动和进行经济斗争的。通过经济斗争这种低级形式活动，以进行团结教育群众，便于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提高工农群众觉悟，开展政治斗争。这是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四）县委改选

至一九二七年冬，阳江成立县委已半年，其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同志生活困难，隔离太远，组织较散漫等。在革命低潮中未能解决各种困难问题，难以开展工作，特别对武装斗争有不同观点。在此情况下，四月初，二区丹载乡党支部及四区北宿乡党支部联合提出改组县委，终于通过把旧任县委一律免职，县委书记许高爵予以警告处分。改选冯宝铭、许基旭、敖华褒三人为县委常委，任冯军光、阮绍元（退之）为技术干事（冯、阮两同志当时不在阳江）。这时党员二十二名，工农民团分子占十分之六，知识分子占十分之四。成立四个支部：阳江城支部，三区丹载乡支部，四区北宿乡支部，六区织篢圩支部。县委机关设在丹载小学。为纯洁队伍，加强组织纪律，开除了谭家驹等三人的党籍。（注一）

（五）关于暴动问题

在革命低潮时，革命力量的发展，困难多而易受挫折，而反动派更不会放弃其势力与地盘。四月中，丹载乡反动势力勾通县长撤换了民团团长，党在丹载所争取和利用的势力随之消失。同时，反动派又掌握了乡村政权，权力全部在反动派手中，我党活动因而非常困难。于是党内有人提议乘机暴动，杀掉土豪劣绅，宣传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府，如不能固守，就做政治的“流寇”。经过争议，认为群众没有起来的暴动是没有保障的，而且武装力量薄弱而可以借助的权力又已转移，因而主张暂不暴动，而应扩大和积极发展农民组织，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去发动群众，创造条件，进而组织暴动。

但是，省委对于反动派撤换了丹载乡民团团长这件事，认为阳江县委不积极利用民团这部

分武装去做发动和组织暴动的力量,是避免斗争的严重问题,遂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给县委指示:一、马上改换旗帜,编成赤卫队常备队,并即扩大成一中队;二、即刻无限制的组织自卫队,袭击当地豪绅地主;三、即刻用当地农民最苦的事实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四、用丹载乡斗争的影响发动各乡斗争;五、在斗争中去扩大武装的组织;六、斗争起来,如经受挫折,这部分武装应逃上山去而继续向其他乡作游击战争。这样,才能发动群众走上接近暴动的道路。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处境的不利,对省委组织发动暴动的指示,未能执行。

(注二)

二、在反动派高压下继续战斗

(一) 县委机关被搜查,领导转移

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丹载“公益会”在党组织布置下,在丹载村外一个竹林中举行群众喜用的焚香宣誓“仪式”,借以加强团结。事毕返村。新任反动的乡民团长许基谓闻风即带团丁搜查丹载小学,说村边竹林,发现火光,有数十人入村。当时党员教师谭履谦卧室里有党的刊物《红旗》和印宣传品的泥印机,未被搜到。民团走后,党组织紧急研究,由于冯宝铭(化名陈光)在丹载无职业,易引起怀疑,可能敌人准备动手,遂决定冯宝铭与许基旭当晚先走。冯宝铭到香港后,被派往云浮县工作。

(二) 重组工会,继续战斗

冯宝铭离阳江后,中共阳江县委郑锦源将泥印机转移到县城冯国治工作的茂利理发店,由陈崑才、陈宝才、许名飞乘间到处缮印宣传品。同时秘密通讯处由化民医院转到茂利理发店。

郑锦源发展了冯国治等三个理发工人入党后,于秋末组织理发工会。冯国治被选为理发工会理事。这是清党后,在党领导下又重新成立的工会。

三、在反动派疯狂逮捕下,阳江党组织中断联系,停止活动

理发工会刚组织起来,工会委员还没有就职,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嗅觉非常灵敏,刚有点活动,就大肆捕人。郑锦源同志闻逮捕风声,立即撤往香港。但是,反动派不会因此罢手,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正月初七日),冯国治在茂利理发店被捕了。不久,解往广州南石头惩戒场,被判处徒刑五年。

反动派的摧残是没有止境的,许基旭在澳门难以立足,便转返阳江。为开展工作,许基旭有时与许会新、陈崑才在阳江城太傅路光华歇业店碰头或开会。距冯国治被捕月余,这三位

同志在这店中又被捕了。陈崑才由教会保释，即离阳江赴虎门当教师去了。不数日，敌人又派兵到丹载村逮捕许名飞。名飞闻风逃避，捉了他的父亲，坐了一年牢狱，卖了田产才赎出来。许基旭、许会新既无田产，敌人又找不到他们的破绽，才和名飞的父亲一同被释放了。

由于同志连续被捕、与省委联系中断，而风声日紧，许高爵于四月赴上海。七月，许高爵与廖绍珪从广州回来，研究阳江情况后，曾同到香港找省委领导。当时香港情况也极恶劣，没法找到领导联系，阳江县党组织在极恶劣环境里，不能活动，便无形停顿了。但许、廖等仍常注意联系团结和启发教育进步青年，伺机恢复。到抗日战争爆发，春风吹又生，又继续开展战斗了！

注一：见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中共阳江县委给省委报告》。原件存于广东省档案处。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南路特委给省委第一号报告。

注二：见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中共广东省委致阳江县委信》。存广东省档案处：
《中共广东省委》1928--63号

（中共阳江县党史征集、研究小组办公室稿）

阳江豆豉

冯一森

阳江豆豉，是广东省阳江县三个传统特产（阳江漆器、阳江小刀、阳江豆豉）之一。它的特点，主要是原料和产品的风味、制作技术有它特殊之处。所以长期以来，阳江豆豉成了家喻户晓的佐膳佳品。豆豉能和百味，它既给菜肴增香添色，刺激食欲，使用也方便，只要放进少许，就能使食品别有一番风味。中外驰名的广东菜多有用它作配料。象过去曾获得国家银质奖、今年度进而获得国家金质奖而远销中外的广东“豆豉鲮鱼”罐头，就是以阳江豆豉厂生产的阳江豆豉为主要辅助材料的。（据说在高温压缩下，别的豆豉会成为糊状，而阳江豆豉，却豉味更浓香而又颗粒玲珑。）

阳江豆豉有三大特点：其一，原料。生产阳江豆豉的原料必须选用阳江本地区所产的黑豆。其中尤以平冈区、麻浦区、双捷区的质量最好）特异之处就是阳江黑豆皮薄肉多，颗粒适中，皮色乌黑油润。其二，风味。阳江豆豉营养丰富，据阳江豆豉厂的产品化验：含蛋白质20%，脂肪7%，碳水化合物25%及矿物质、维生素等。特别是风味；它以外观颗粒完整、皮色乌黑油亮、豉肉

松化、豉味浓香、鲜美可口、余味绵长的特色，在国内同类产品独具一格而素负盛名，在港澳市场上被誉为“一枝独秀”。其三，制作技术精细独特。阳江豆豉的制作，经过十道工序，历时四十多天，采用有盐低温发酵法来酿制。制法的过程，是将经过挑选的黑豆浸水，浸泡好了的黑豆用蒸气蒸熟而成为曲料；曲料经摊凉后上竹窝入曲房制曲，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历时五天使豆豉菌长成后便成为成曲；把豆豉成曲的霉用清水洗净并加食盐等辅料拌匀后，储于陶器——豆豉埋中密封，经一个月后发酵成熟，出埋晒干即成为豆豉成品。

我国豆豉生产历史是悠久的。古代称豆豉为豉，也叫嗜。《古今图书集成》中，有黄河流域一带制作豆豉的记载。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将“豉”解为“配盐幽步也”（意思是“加盐的黑豆”）。

早在公元前，我国豆豉的生产就已初具规模。汉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就有记载。到了北魏时期，就发展到作坊生产。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记载有“屋三间，得作豆百石”常作者，番次相继，恒有热气，皆不

需稷覆”。这就记述了生产规模和一批接着一批生产的繁忙情况。从生产方法和工艺规程看，至北魏时代就已基本定型，而且一直沿袭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似乎古代对制作豆豉的工艺要求，比现在更严格。上述总结，足以说明我国豆豉生产历史的悠久。

至于豆豉生产的地区分布，这也和中国古代文化源流一样，是发祥于黄河流域一带。当日陕西、山西蒲州等地，豆豉生产已较风行，后来江西、山东、湖南等相继有所生产，而现在，四川、江苏、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皆有生产。我们阳江豆豉大概是从湖南——韶关——肇庆这条路线传播而来的。现今，四川省潼川的三台，江西的泰和，湖南的长沙、浏阳以及我们广东的阳江所出产的豆豉是比较有名的。

阳江豆豉在吸取北方制作经验的基础上，经不断的演变和改进，形成了一套具有南方特点的独特加工方法。远在明末清初时，就已制作出色、香、味俱佳的阳江豆豉，为群众所乐用，因而生产日渐发展，成为本县三个传统特产之一。

阳江豆豉虽是历史悠久、又是有名的传统特产，但阳江历代修志，概不具载，而专门著述，更付缺如，所以它的长远历史，很难追述。现只从该行业中的老工人的回忆拾缀中，略知阳江豆豉业在解放前的近数十年间的产销梗概。

老一辈人都知道阳江豆豉生产的字号最大的是“三德”。三德豆豉的产销情况，虽无可靠的资料加以具体说明，但以当时阳江城的许多行业以“三德秤”作为通用的衡器（买入，21.5两为一斤；卖出，20两为一斤），就可知道它经营渠道之广，在商场势力之大了。可是到了1918年以后的几年间，阳江经历“南北军”之役，“梁士铎入城”之役，“八属联军”之役，兵连祸结，盗匪如毛，致使阳江百业凋残，民不聊生，三德号的豆豉业也自然衰落了。1925年后，两广统一，北伐军兴，其后虽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新军阀混战，宁粤对立，但广东省内有着一短暂的相对稳定的局面。于是阳江工商业得到复甦，豆豉业又兴盛起来了。这期间，经营豆豉业最大的字号有富记、大来、发源栈、广亨等。其中富记所生产的虽价钱稍昂，但货真价实，所以它的销路最广，产量最大，每年约生产25万斤左右。而其他字号也只略逊于富记。所以，那时阳江豆豉生产是大宗的。它外销四邑，广州等地，香港也有客户；在海外，凡有华侨侨居的地方，都有阳江豆豉销售。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侵略中国，阳江城也不时受日机侵扰和轰炸。1941年，日本侵略军更曾短期侵占过阳江县城。因此，阳江城的工商业不时受到威胁，也曾一道受过洗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阳江城的豆豉业生产，

便大量收缩，有的生产豆豉的店号甚至歇业了。但又由于人民生活的需求，豆豉的销路还很广，于是处境较为安全的乡间圩镇中的店户，便纷纷起来经营豆豉业。其中以离城约20公里的北惯圩生产最为大宗。计北惯圩利泽、深记、公和三间店号每年都生产30多万斤。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至1949年阳江解放这几年来，阳江城的生产豆豉的老字号仍继续经营，而且还增开了和发、德盛、大源、富盛、新福源、天和等生产豆豉的店户。但那期间外销的产品仍以北惯圩的为大宗。

解放前经营豆豉业的工商业者，一靠使用“三德秤”的大秤买入、细秤卖出而非法牟利，二靠以十斗为一担（约一百三十斤）买入原料（黑豆）的价钱算为卖出时一百斤产品的成本而获高额利润，特别那些财雄势大的豆豉店老板，总是进行粮、豆两种的囤积居奇，重利盘剥。解放后，这样的种种非法经营已不容许存在，他们所经营的豆豉业，当然停歇下来。在解放后的三数年间，阳江的豆豉生产，是由那些熟悉生产技术的师傅、店员进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以供应当地人民生活的需要，而外销的则极少极少的了。1955年，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豆豉生产合作社，其后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地方国营豆豉厂。这样，阳江这一名牌的传统产品的生产获得恢复，而且更迅速地获得发展。

地方国营阳江豆豉厂创办的时候，厂址是将海洲路的一个旧菜市场（兴仁市场）改造而成，占地3000平方米，设备简陋，只生产豆豉一种产品，产量很少，只有月产七吨豆豉。1958年，阳江县食品二社、食品三社并入豆豉厂，职工人数稍增到76人，厂场也扩展到5000平方米，产品品种增加了酱油、南乳、腐乳等。豆豉产量也扩大到了月产100多吨。到60年代初，在厂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对历来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进行了改革，使生产用上了蒸气和动力机械，初步改变了过去连一点动力、机械设备都没有的完全手工操作状况。1975年又把厂址迁移到牛路口，占地20,000平方米。近几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全厂职工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和安装各种豆豉生产设备，改变了生产落后面貌。其中重大项目是1982年改革成功了豆豉生产半机械化流水作业线。这条流水作业线由一座五层的豆豉生产大楼为主体车间，由上到下，实现流水作业。整条流水作业线布局合理，设备比较先进，大大的减轻了工人的体力劳动，稳定了产品的质量，是千百年来阳江豆豉生产的最大变化。这一项目，1983年获得轻工业部四等奖。

豆豉的生产技术，从1960年起就建立了化验室，配合生产实践开展了对豆豉传统生产技术的探讨试验和科学总结工作，把科学

管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使古老的传统技术更显光彩。现在对豆豉的生产环节加强了技术质量管理，制定了豆豉质量标准，开展了QC活动。1983年，豆豉质量QC小组被评为广东省轻纺工业系统的优秀QC小组。

地方国营阳江豆豉厂，在上级的支持帮助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前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阳江豆豉厂生产的阳江牌阳江羌豉保持并发扬了传统的阳江豆豉的特点，以其质量优良而饮誉中外，畅销38个国家和地区。1978年被评为湛江地区名牌产品，1980年被评为广东省优质产品，1983年被评为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而产量则在1983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计年产豆

豉1250吨。相信，在当前工业改革的大好形势下，阳江的豆豉生产水平，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必然会出现新的高度。

大宗生产阳江豆豉的，除国营阳江豆豉厂外，还有阳江二轻酱料厂和江城副食综合厂。二轻酱料厂前身是二轻食品厂（1971年前），生产各种酱料，其中以生产豆豉为大宗，最高年产量为360吨。江城副食综合厂建于1964年末。它所生产的豆豉，初期年产量为120吨，现在达到1000吨左右。这两个厂产品的质量和国营阳江豆豉厂产品的质量是不相上下的，所以这两个厂的豆豉生产获得逐日发展，也都承担着出口任务。

（鲁静 整理）

阳江设关史略

谭启浩

据《梁书·王僧儒传》记载，阳江作为高凉古郡，梁朝时便与海外有交通贸易，但没有设关的记载。唐、宋、元、明四代在一些口岸设立我国古代的海关机构——市舶司（使），阳江也未设立。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粤海关才在县城西门外石觉寺左，设税关，以抽货税。（《阳江县志》）（注一）。这是我国以海关制度代替市舶司制度最早在粤西设立的关。

清初，东南沿海地区为台湾的郑成功和南明政权所控制。清统治者为了和他们作斗争，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定，工部尚书杜臻奉诏巡视闽粤沿海，使命之一是考察开放海禁是否可行。杜于当年十一月从北京启程，于第二年五月竣事。杜复命后，清政府于是年开海贸易。康熙二十四年以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口岸，并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阳江税关是粤海关成立的当年设置的。中国海关自一六八五年成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订立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而失去自主权后，以前的一百七十多年，一直是我国独立自主的海关（注二）。

粤海关的管辖区域为总口七处：看城大关（“十三行”及黄埔各国商船进出口）、澳门总口、惠州口、潮州口、雷州口、琼州口和高州口。总口之下又有多处小口，阳江税关当属于高州口。（据李康华等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

阳江设关后到二十世纪初期二百多年时间的演变情况未见史志记载。江门于一九〇四年四月根据一九〇二年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开辟为商埠，同时设立江门海关。阳江税关划归江门海关管辖。但具体时间未能查到记载。据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关务署核定，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编印的《海关法令汇编》记载，江门海关关区有江门、广海口、崖门、三夹口、北津口五个分卡，都斛、闸坡、阳江三个分所。其中北津口分卡，闸坡、阳江分所属于阳江县境。分卡的职权是准许华籍民船，容量在二百担以上者，得往来国外贸易，起卸货物，及完纳税款。其容量未满二百担者，不能援以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阳江海关机构变化很大。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江门相继陷落。广州海关和江门海关都